

# 余光中在一九七〇年代台港文學 跨區域傳播影響論

須文蔚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 中文摘要

本研究以余光中為例，分析七〇年代的台港文學傳播與互動關係。台、港七〇年代文學界，都開始正視中國傳統，掃除五、六〇年代現代主義文學過於西化、晦澀及自我的弊病，期盼將文學植根傳統，反映現實，並追尋本土性與認同。余光中七〇年代在港、台文學傳播最大的意涵，莫過於以其綜合古典與現代主義的理論，在引介英美現當代文學的同時，讓兩地詩壇重新省視傳統與當代的交互影響力。研究也發現，台、港在七〇年代開始，文學的學院體制日益健全，香港中文大學從七〇年代中葉，開始重視現、當代文學發展，聘任余光中、梁錫華、黃維樑等作家、比較文學學者與翻譯家，開設系列課程，改變了文學教育的方向與結構，也展現出當時媒體重視學院作家的影響力。而「沙田幫」文友之間的聚合，形成當代文學研究的課題，從布爾迪厄（Bourdieu）的「文學場」理論中，不難發現學者在文學場域中具有「支配權力」，特別當學者社群透過文學評論的力量，強化了運用象徵資本爭取象徵支配權，自然更加引發矚目與重視。而在台灣七〇年代文學場域中，余光中在台港間的跨區域文學傳播現象，正說明了學院作家高度的影響力，當時文學傳播場中，媒體借重海外知識分子的論述衝擊封閉的文化環境，無論在現代詩論戰、鄉土文學論戰

以及香港作家的推介上，余光中的評論文字都備受矚目，成為論戰或是閱讀的焦點，自有其來自文學傳播結構的影響力。

關鍵詞：余光中、文學傳播、現代主義、香港文學

# Yu Kuang-chung's Influence of Multi-area Literary Communication in 1970's

Shiu Wen-wei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inophone Literature,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sed Yu Kuang-chung's (余光中) influence of multi-area literary communication in 1970's. At that period, the literary world began to think highly of the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They expect that literary circles to reflect the social reality and nativism. Yu met with success to construct a conformability theory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odernism. In the meanwhile Yu also introduced and translated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works. Yu did open and enlighten a lot of poets both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This study also discovered the academy system of literature attained to maturity in 1970'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mphasized the course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They hired many writers, scholar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translators, like Yu Kuang-chung, Liang Hsi-hua (梁錫華), and Wong Wai Leung (黃維樑). They were invited to host some series of curriculums which created literary education a new milestone. Finally, Yu made a great impact on readers, young writers and literary circles in the field of multi-area literary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Yu Kuang-chung, Literary Communication, Modernism, Hong Kong Literature

# 余光中在一九七〇年代台港文學 跨區域傳播影響論

## 一、前言

1999年余光中出席個人傳記的新書發表會時，曾感性地說過，他離開故鄉時，已二十二歲，大二的學生，記憶自然深刻，所以成為年輕時創作重要的主題，然而，「鄉愁」從不限於某一鄉，或某一鎮的概念。他曾住在香港十一年，回到台灣時，又像是一個被反鎖在門外的人，家人來開門，我不認得他，他也不認得我了<sup>1</sup>。城市空間的轉換，帶給詩人莫大的生命衝擊，成為文學研究的絕佳題材；詩人跨區域文學傳播的現象，也是一個饒富趣味的議題。

過去論及台港文學，一般認為香港文學深受台灣文學影響。事實上，五〇年代的台港作家，詩人過從甚密<sup>2</sup>。香港文學在現代主義的介紹上，確實深刻地引導了台灣的詩壇。六〇年代台灣文學反過來對香港文學產生更多影響，尤其是不少香港作家來台求學，成名後的文學創作多在台灣出版，可為例證。另一個更為特出的現象，莫過於余光中跨區域文學傳播的影響力。

余光中和香港文壇的互動始於六〇年代初期，他的新詩集《鐘乳石》由香港「中外畫報」出版。同一時期，他與宋淇、張愛玲譯的《美國詩選》，也對台灣的現代文學產生影響。余光中在六〇年代轉化中國古典詩的意象和境界的詩學主張，曾藉由學生溫健騮，影響香港詩壇。而真正展現余光中在台灣與香港

<sup>1</sup> 陳文芬，〈余光中傳記茱萸的孩子圖〉，《中國時報》，1999年2月4日。

<sup>2</sup> 施建偉、汪義生，〈當代香港文學的鑄形——回首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學〉，《香港文學》147期（1997年3月），頁4-7。

的跨區域傳播能量，莫過於七〇年代初應邀《詩風》周年紀念朗誦會演說，並於 1974 年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十年的特殊機緣，使他和香港結下不解之緣，也為台灣文壇引進了許多香港文學風華。

本文擬就文學傳播的進路，觀察余光中於 1973 年「《詩風》周年紀念朗誦會」演講，以及 1974 年以降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時，影響台、港文學跨區域傳播的現象，以釐清七〇年代的港、台文學，微妙的傳播與互動關係。

## 二、余光中七〇年代的香港經驗

余光中七〇年代有兩度與香港文壇互動：一為，1973 年受《詩風》的邀請，赴港演說。一為，1974 年以後，受聘於香港中文大學，在香港居住長達十年。

### （一）1973 年「《詩風》周年紀念朗誦會」演講

《詩風》創刊於 1972 年 6 月 1 日，由香港青年詩人黃國彬提議，在陸健鴻、羈魂、譚福基、郭懿言等人贊同下創立，是七〇年代香港的重要詩刊<sup>3</sup>。《詩風》創刊的宗旨在於回應六〇、七〇年代台灣現代派詩人「橫的移植」的主張，固然現代派詩人在吸收與介紹外國現代詩的優點方面功不可沒，但要徹底打倒傳統，與傳統脫離關係是行不通的。在《詩風》的發刊詞中直指：

我國文學自詩經以降，都是逐漸衍變的。雖然，一代有一代的文學，但後一代文學每每由前一代漸變——不是突變——而來。舉例來說，唐詩與宋詩之間就有些作品具有詩與詞二者的形式；杜甫詩中很多詞彙便摘自六朝詩篇與經史。即使與文言文分庭抗禮的語體文，很多時也要借用文言的詞彙成語，否則便會成為「淡乎寡味」的白開水。至於反對傳統的詩人，寫起現代詩時也不能做到絕對地反叛傳統。所以高唱反叛傳統，猶如坐在樹樞而要把樹樞鋸斷一樣可笑。<sup>4</sup>

<sup>3</sup> 林煥彰，〈簡介「詩風」〉，《文訊》20 期（1985 年 10 月），頁 89-93。

<sup>4</sup> 詩風編輯室，〈發刊詞〉，《詩風》1 期（1972 年 6 月），頁 1。

《詩風》的主張無疑對台港五〇、六〇年代過渡西化的現代詩發展，提出批判，更進一步要求詩人必須「創出自己的面目」，儘量避免有外國語言、思考的痕跡，標舉出：「一首理想的詩，應該有其不可譯的豐富性與繁複性」<sup>5</sup>。

《詩風》編輯群的詩學理論與余光中的理念十分接近，從六〇年代開始，余光中一方面對抗五四傳統的陰影，同時與現代主義者辯論，要求「回到中國來」。余光中在「《詩風》周年紀念朗誦會」的演講中以「中國的現代詩，從何處來，向何處去？」介紹現代詩的演變，主要從李金髮、戴望舒以降受象徵主義和現代主義的詩風流變談起，論及台灣五〇年代後，現代派、超現實主義、新古典主義的辯論，同時也將七〇年代後《龍族》、《大地》、《主流》等新興詩刊的反省，一併介紹給香港文壇<sup>6</sup>。

在演講中，余光中特別將新古典主義形容成是對超現實主義的反動、反其道而行，更強調他回歸傳統的主張，接受了西洋現代詩人艾略特（T. S. Eliot）的啟示。余光中引用了艾略特在〈傳統與個人的天賦〉一文中提及的觀點：

任何一位詩人，任何一種藝術的藝術家，都不能憑藉一己的力量使他的作品獲得完整的意義。我們要瞭解他、鑑賞他，就得要瞭解並鑑賞他和那些業已亡故的詩人和藝術家之間的關係。你無法對一位作家予以獨立性的評價。你必須把他放在已故的作家們中間，藉以對照和比較。這不僅是歷史觀的批評法則，且也是以審美觀點出發的批評原則。<sup>7</sup>

繼而余光中主張，一個現代人雖然生活在工業文明中，但心靈活動會受到許多背景知識影響，古典文學占有非常重要的比例。如果以詩創作為例證，艾略特、杜甫都能夠出古入今，鎔經鑄史，將經史子集的典故寫進詩中，足證古典文學是不容輕忽的。進一步，余光中說：「在這種了解之下，有好幾年來，我自己寫的詩，譬如在《蓮的聯想》裡面，也就是把這個理論用到現代詩裡面來。」<sup>8</sup>

<sup>5</sup> 同前註。

<sup>6</sup> 余光中，〈余光中先生「詩風周年紀念朗誦會」的演講詞：中國的現代詩，從何處來，向何處去？〉，《詩風》14期（1973年7月），頁2-3。

<sup>7</sup> 艾略特著，朱南度譯，〈傳統和個人的天賦〉，《諾貝爾文學獎全集24》（台北：遠景，1983），頁107。

<sup>8</sup> 余光中，〈余光中先生「詩風周年紀念朗誦會」的演講詞：中國的現代詩，從何處來，向何處去？〉，《詩風》14期（1973年7月），頁1。

在演講中，余光中修正了新古典主義，認為只是單面向從中國的文學中，接受中國的精神，以及中國文字的特長，然後融化到新詩中，仍有所不足。更要同時在現代詩創作上進行現實環境的觀察才行。他指出：

一方面恐怕要認識中國當代的環境，民族的環境，就是說，一方面是中國的過去，一方面是中國的現實，這兩方面加起來，才能夠成為中國精神的全貌，如果僅僅從文字方面去發揮，文學方面去發揮，而忽視了當前的現實，那恐怕就比較殘缺一點。<sup>9</sup>

顯見余光中體察了台港文壇現代主義虛無的缺點，對此提出了針砭，也呼應了七〇年代台灣新世代詩人群對於五、六〇年代「橫的移植」詩風的厭棄，特別是《龍族》的象徵之下，陳芳明、施善繼、辛牧等人對於反歸中國傳統的理想主張<sup>10</sup>。

余光中的演講在香港文學界也引發了一些討論，龍秋在《中國學生周報》第 1092 期上就為文指出，香港的現代詩運動表面似乎是沉寂了的，暗地裡還有生長繁殖的希望，余光中的演講有助於擴展香港的現代詩運<sup>11</sup>。而半枝荷則詳細地側寫余光中演講，對於余光中在答覆聽眾問題時指出，詩人如果要關心社會問題，那不如去做社會工作者好了。半枝荷不以為然地反駁：

這句話是追不上時代的，詩人的心靈比一般人較為敏感；所以詩人比一般人更應該關懷大眾，更懂得怎樣去解決他們的痛苦，然後透過詩的形式去反映社會問題，去接觸大眾，影響大眾。如果詩人只關心自己，只抒發個人的思想感情；而不去關心別人，不同情民間疾苦，那麼現代詩與群眾隔離，是無可避免的了。<sup>12</sup>

在充滿批判力的青年心目中，余光中雖然在此次演講提及關心民族現實環境，但在具體社會實踐上的保留，依然不能夠滿足香港青年的熱情。不過由於這次

<sup>9</sup> 余光中，〈余光中先生「詩風周年紀念朗誦會」的演講詞：中國的現代詩，從何處來，向何處去？〉，《詩風》14 期（1973 年 7 月），頁 2。

<sup>10</sup> 向陽，〈七〇年代現代詩風潮試論〉，收錄於林耀德編，《當代文學評論大系二》（台北：正中書局，1993），頁 332-333。

<sup>11</sup> 龍秋，〈從余光中訪港說起〉，《中國學生周報》1092 期（1973 年 6 月），8 版。

<sup>12</sup> 半枝荷，〈詩人余光中演講側寫〉，《中國學生周報》1091 期（1973 年 6 月），4 版。

演講，加上日後赴香港中文大學任教，余光中成為《詩風》發表詩作最多的台灣詩人，和楊牧、洛夫、羅青等人，都深受《詩風》編輯群的重視<sup>13</sup>。

## （二）1974 年以後的沙田生涯

七〇年代初，譯作家、評論家宋淇（筆名林以亮）<sup>14</sup>擔任香港中文大學李卓敏校長的特別助理，有鑑於中文大學中文系的發展過於保守，過於專注在古典文學研究與教學，輕忽現、當代文學的發展，於是宋淇就跟校長引薦余光中，希望改變中文大學中文系的學風<sup>15</sup>。余光中於 1974 年接聘，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的教授，自此展開十年的沙田生涯，直至 1985 年返回台灣接任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告一段落。

余光中在中文大學期間著有大量關於「沙田」的地誌書寫，1981 年更主編《文學的沙田》一書，將「沙田」這個地名推向了華語文學世界。詩人謂：至於專詠香港或與香港地理有涉的詩中，常提到沙田一名，則需要略加解釋。沙田是新界的一個小鎮，也是九廣鐵路中途的一站，南距九廣路起點的紅磡，約為北距廣東邊界之半。中文大學即在其北五英里的馬料水山上，面對湛湛一碧的吐露港海灣，而八仙嶺蔽其北，馬鞍山屏其東，山圍水繞，日起月落，自成一個天地，我的一千六百多個日子便俯仰在其中。風景之美，凡來相訪的臺灣文友，想都留下頓深的印象。<sup>16</sup>

<sup>13</sup> 根據林煥彰（1997 年）的統計，台灣的詩人在《詩風》發表過詩作的有二十餘位，分別為：余光中、羅青、林煥彰、苦苓、楊牧、渡也、洛夫、白萩、周夢蝶、蓉子、羅門等。以余光中為最多，羅青、林煥彰次之。港、台兩地現代詩壇在七〇年代的《詩風》上互動頻繁，不僅僅出現在作品的交流，為了慶祝創刊四周年，《詩風》舉辦的「詩風四周年紀念詩獎」，公開徵稿，有五十餘人參加，收到二百多首，香港和台灣應徵作品，約各佔一半。由楊牧評選，最後由苦苓的四首詩獲獎，也是一個港台文壇互動的例證。

<sup>14</sup> 筆名林以亮的宋淇，是浙江吳興人，1949 年後至香港，曾任邵氏、電懋電影公司編劇、國語片製片，曾力促張愛玲寫作劇本。六〇年代後，宋淇創辦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學英譯半年刊《譯叢》，擔任香港中文大學翻譯中心主任，七〇年代曾應邀來台出席紅學會議。

<sup>15</sup> 黃維樑，訪談記錄，2008 年 3 月 25 日，花蓮：東華大學。

<sup>16</sup> 余光中，〈「與永恆拔河」後記〉，《聯合報》「聯合副刊」，1979 年 3 月 23 日，12 版。



余光中不只專注在沙田的地景、人物書寫，在此地與宋淇、蔡思果、梁錫華、黃國彬、黃維樑、陳之藩、胡金銓、劉國松等人談文論藝，相濡以沫，形成了華語文學界一個突出的文學社群。

余光中在香港期間，創作、評論與翻譯不輟，出版有《余光中散文選》（1975年香港版）、《天狼星》（1976年）、《青青邊愁》（1977年）、《梵谷傳》（1978年新譯本）、《與永恆拔河》（1979年）、《余光中詩選》（1981年）、評論集《分水嶺上》（1981年）、詩集《隔水觀音》（1983年）、翻譯王爾德喜劇《不可兒戲》（1983年）、《土耳其現代詩選》（1984年）等。香港與台灣的時空移轉，加上大陸與香港一水之隔，都讓余光中文學創作的靈感不斷湧現，成為詩人創作生命中，量與質都比重極大的一段時間<sup>17</sup>。

如就文學傳播的角度觀察，余光中在七〇年代的發表也橫跨台港兩地，甚至不乏一稿兩投的現象。余光中在〈《與永恆拔河》後記〉中說：

由於臺灣和香港的刊物往往互不相通，四年來的新作常同時刊於兩地，香港的雜誌屢刊我詩者是「詩風」和「明報月刊」。「中秋月」一首僅載於「明報月刊」，從未在國內發表。「拉鋸戰」一首初載於「幼獅少年」，後來加以大幅修改，又在香港的「青年文學」上刊出。<sup>18</sup>

在臺灣的文學傳播研究上，焦桐就指出<sup>19</sup>，詩刊難以向名家約到稿件，不少詩人詩作先在報紙副刊或文藝雜誌發表，才交詩刊轉載，由於小規模發行的現代詩刊，只能流傳於詩人和部分關心詩刊者之間，影響力小，不得不接受一稿兩投。如果放眼跨區域的文學傳播上，名家創作在港、台兩地一稿兩投，讓不同地區讀者有機會閱讀，藉此擴大影響力，也成為兩地副刊、文學雜誌編輯台上接受的現象。

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任教期間，也參與香港文學界的諸多活動，擔任文學獎評審、演講與座談頻繁，影響了當時香港青年詩人黃國彬、陳德錦、

<sup>17</sup> 流沙河，〈詩人余光中的香港時期〔上〕〉，《香港文學》48期（1988年12月），頁16-19。

<sup>18</sup> 余光中，〈「與永恆拔河」後記〉，《聯合報》「聯合副刊」，1979年3月23日，12版。

<sup>19</sup> 焦桐，〈現代詩〉，《臺灣文學的街頭運動》（台北：時報，1998），頁283。

曹捷等人，香港詩壇一度有「余派」之說，自然也起因於大師在校園與社會多重的影響力<sup>20</sup>。

### 三、問題意識

本文的問題意識沿著筆者國科會研究「文藝思潮跨區域傳播現象研究：以五〇至六〇年代現代主義文學在台灣與香港間的傳播為例」，希望以跨區域傳播的角度探討當代文學史。過去本地學者研究台灣文學史的現代主義美學思潮爭論時，多半僅論及本地在五〇至六〇年代的文學出版作品。討論的文本多半環繞在 1949 年之後，刊登在《現代詩》、《創世紀》與《現代文學》等現代主義立場鮮明的刊物，以及與現代主義文學社群相抗衡的《藍星》等文學團體上。然而，在五〇與七〇年代與台灣相互唱和的香港文壇，產生共時性的影響，卻鮮少為學者注目。本文將以余光中 1974 年至 1985 年在香港任教期間，為台港間文學思潮的交流與匯聚所產生的跨區域傳播現象為例，闡述此一特殊的文學現象。

#### （一）跨區域文學傳播研究視角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的研究領域中，王德威指出<sup>21</sup>，由中國大陸所主導的「大敘述」鋪天蓋地，儼然以正統自居，台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都成了邊陲，聊備一格。大陸近年來已經有不少學者提出「華人文學」<sup>22</sup>或是重視「區域的文學本土性」<sup>23</sup>，以期消除意識型態干擾學術研究，重視「華人心靈史」的挖掘，以及深入不同區域華文文學史中，找出華語文學的真正的面貌。

相對於中國大陸學者的研究取向變化，區域文學史書寫的主張，也在台灣與香港興起。1980 年以降，葉石濤提出《台灣文學史綱》以後<sup>24</sup>，建構台灣文

<sup>20</sup> 鄭樹森，〈香港專輯 回顧香港在海峽兩岸間的文化角色 11：臺港的新詩互動〉，《聯合報》「聯合副刊」，1997 年 6 月 26 日，41 版。

<sup>21</sup> 王德威，〈《本土性的糾葛》序〉，《香港文學》231 期（2004 年 3 月），頁 81。

<sup>22</sup> 黎湘萍，〈族群、文化身份與華人文學——以臺灣香港澳門文學史的撰述為例〉，《華文文學》，1 期（2004 年 4 月），頁 5-16。

<sup>23</sup> 朱崇科，〈文學空間詩學與區特質論綱——以新馬華文文學為例加以說明〉，《香港文學》272 期（2007 年 8 月），頁 91。

<sup>24</sup>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87）。

學史體系的系列「重寫」，成為研究者關注的重要議題，如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sup>25</sup>、游勝冠《臺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sup>26</sup>。又如日據時代的殖民經驗，亦成為學者研究文學史的重要切入角度，如盧建榮《臺灣後殖民國族認同》、陳芳明《左翼台灣》<sup>27</sup>、《後殖民台灣》<sup>28</sup>、《殖民地摩登》<sup>29</sup>等。一言以蔽之，台灣文學史的書寫，均帶有濃厚的「台灣認同」意涵，也有著濃厚的區域文學性質。

在香港文學的發展上，六〇年代以後，本土作家崛起，在七〇年代開始無論在文藝觀或文藝創作風格上都與所謂「南來作家」分道揚鑣。鄭煒明就指出，實質上還包括了歷史與文化身分認同上的分歧、政治意識形態上的分歧<sup>30</sup>。而在八〇年代中期開始，中國陸續出版多本香港文學史或文類史<sup>31</sup>。香港文學界對上述香港文學史的評價不一，批判多於讚揚。多認為大陸研究者的書寫受政治影響，與塑造國家意識形態的教育掛鉤，因此這些香港文學史刻意突顯英國殖民地統治下的文學負面表現，強調香港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關係，特別是三〇年代中期以後大量中國作家南來香港的影響<sup>32</sup>。香港文學史的書寫與建構，盧瑋鑾認為在第一手資料未搜羅齊備以前，不贊成倉卒成史<sup>33</sup>。黃繼持則期待各式各樣的「試寫」，多元參照彼此觀摩<sup>34</sup>。但香港研究者在身分認同的多元討

<sup>25</sup>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高雄：春暉，1997）。

<sup>26</sup> 游勝冠，《臺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台北：前衛，1996）。

<sup>27</sup> 陳芳明，《左翼台灣》（台北：麥田，1998）。

<sup>28</sup> 陳芳明，《後殖民台灣》（台北：麥田，2002）。

<sup>29</sup> 陳芳明，《殖民地摩登》（台北：麥田，2004）。

<sup>30</sup> 鄭煒明，〈香港文學的歷史考察——一個文學工作者的觀點〉，《文訊》217期（2003年11月），頁37。

<sup>31</sup> 謝常青，《香港新文學簡史》（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0）、潘亞墩、汪義生，《香港文學概觀》（廈門：鷺江出版社，1993）、許翼心，《香港文學觀察》（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易明善，《香港文學簡編》（重慶：四川大學出版社，1995）、王劍叢，《香港文學史》（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王劍叢，《二十世紀香港文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6）、劉登翰主編，《香港文學史》（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袁良駿，《香港小說史》（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趙稀方，《小說香港》（北京：三聯書店，2003）。

<sup>32</sup> 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台北：麥田，1997），頁96、99、頁103-105。

<sup>33</sup> 盧瑋鑾，〈香港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收錄於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編，《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1998），頁71-75。

<sup>34</sup> 黃繼持，〈關於「為香港文學寫史」引起的影響〉，收錄於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編，《追跡香港文學》，頁90。

論下，以及反對大陸「大文學史」架構下，完整的香港文學史始終沒有成書，且陸續出現的香港文學論述，都益加強調本土性，與區域文學研究更加接近。

傳統區域文學研究（area literature studies）中，本土意識的突顯無疑至關重要，很多時候，它是某地文學得以安身立命的重要標誌<sup>35</sup>。傳統的區域文學研究因此鎖定了區域中的「住民」作為研究對象，也就是以作家的出生地為探討區域文學的重要判準。持如是觀點者，無非認定作家必然受到區域文化的濡化，個體受到鄉土文化景觀的感染，建構起文化心理結構的框架，終其一生，故鄉會對作家造成深遠的影響<sup>36</sup>。事實上，文學與地理環境的關係一向眾說紛紜，陳慶元認為，正確對待地理環境的前提應該是：在承認不是地理環境而是生產方式決定社會發展的同時，又看到地理環境通過生產力影響人類社會的發展，同樣的道理，文學的發展並非單純由地理環境決定的，但地理環境在一定條件下會影響文學的發展<sup>37</sup>。因此近來在文學社會學以及文學傳播研究上，以作家的出生地作為研究的主要「變項」，可說備受抨擊<sup>38</sup>。

如果將此一辯證關係聚焦於余光中文學研究上，首先要界定台灣文學、香港文學的範疇，考量余光中在台灣求學與長住，更應當考量作家出版、發表與遷移的狀況，亦即將跨區域傳播的現象納入思考，方能清楚理解余光中在香港與台灣觀念傳播的歷程與內涵。

綜上所述，過去當代文學的論述過於膠著於出生該地區的作家，顯然將可研究對象的範圍侷限住了。文學史家陳國球開始關注的問題為更跨區域傳播的焦點，把香港、台灣、大陸的現代主義文學流變，置於同一個傳播脈絡系統下觀察<sup>39</sup>。因此本研究試圖擴大余光中研究的範疇，不以作家的出生地、求學地以及重要書寫位置為單一標準，一併將區域經濟、政治、學術與文化條件的影響，以及作者遷移狀況等條件，加入新興文學傳播研究議題中。希望進一步擴

<sup>35</sup> 朱崇科，〈淺評楊松年《戰前新馬文學本地意識的形成與發展》〉，《南洋商報》，2001年11月30日。

<sup>36</sup> 徐明德，〈區域文化與文學關係斷想〉，收錄於靳明全編，《區域文化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181。

<sup>37</sup> 陳慶元，〈區域文學與地理環境〉，《涪陵師專學報》1期（1999年），頁41。

<sup>38</sup> Escarpit, Robert 著，葉淑燕譯，《文學社會學》（台北：遠流，1990），頁50。

<sup>39</sup> 陳國球，〈香港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運動與李英豪的文學批評〉，《中外文學》34卷10期（2006年3月），頁7-42。

大台灣文學史的研究進路，以余光中為例，跳出區域的限制，可以一窺香港與台灣在二十世紀產生文化思潮交流與匯聚的傳播現象，方能省察出七〇年代台港文化思潮交匯的意義。

## （二）學院在文學場域的傳播影響力

區域經濟、政治、學術與文化條件會衝擊文學傳播，近來文學傳播研究上，開始有學者將研究焦點轉向文教機構、文學團體、文人活動及作品等角度，觀察區域文學因而產生的變貌。例如王於飛以明末東林黨和復社為對象，考究晚明時期江蘇的地方政治文化、文人集團等因素，揭露在區域文學中權力與話語交錯影響的文學史實<sup>40</sup>；以及施懿琳以台南府城古典文學的發展為研究對象，細膩地就文教機構、文學團體、文人活動及作品等條件為基礎，藉以建構台南古典文學史<sup>41</sup>。可以發現，文學傳播研究中，已經開始擺脫地理與作家相互影響的層面，尋求更多樣的論述主題。

事實上，隨著教育機構不斷分殊化與建制化，學院教師在文學傳播結構中，具有重大影響力，也占據著文學場域中的決定性地位<sup>42</sup>。在文學社會學的討論中，學院在文學場域中具有「支配權力」，因為學院透過文學評論的力量，強化了運用象徵資本爭取象徵支配權，因此有改變一般大眾的信仰體驗與價值觀，獲得認可、服從、正當化等力量<sup>43</sup>。詳言之，隨著學院學科建制與專業標準的建立，全知、博雅的知識分子漸漸式微<sup>44</sup>，文學評論走向學術化、職業化與專業化，大眾媒體會選擇高學歷的評論者，以擁有博士學位與擔任教職為優先，

<sup>40</sup> 王於飛，〈明末東林復社的一個側影〉，收錄於靳明全編，《區域文化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65。

<sup>41</sup> 施懿琳，〈臺南府城古典文學的發展研究與展望〉，發表於「跨世紀／第一屆臺灣文學史料編纂研討會」，嘉義：中正大學，2000 年。

<sup>42</sup> Bourdieu, P., S. Emanuel, Trans.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Oxford, UK: Polity Press, 1996). 劉暉譯：《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頁 154-155。

<sup>43</sup> 張錦華，〈從 Pierre Bourdieu 的文化社會學看閱聽人主體〉，《傳播理論》9 期（2002），頁 78。

<sup>44</sup> Shumway, D. R. & Messner-Davidow, E. "Disciplinary: An introduction," *Poetics Today*, 12: 2 (1991). 黃德興譯，〈學科規訓制度導論〉，收錄於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文化社會研究譯叢編委會，《學科·知識·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頁 7-9。

依照專長負責特定領域的文學評論工作，文學評論者不但走入文學院，而且不再廣泛地就社會、文化議題發出議論<sup>45</sup>。

在大眾媒體時代，從文學傳播的角度觀察文學評論者，他們大量接受媒介的邀稿，成為大眾媒介的編制外工作者<sup>46</sup>，和傳統媒體研究所稱的「守門人」——編輯——實無二致，介於文化產業與消費之間，掌控了文化產品的生命週期，為大眾釐定文化產品的目錄或清單，甚至決定當代的文學經典，文學評論者一時之間與媒體的權力結合，成為「文化守門人」(cultural gatekeepers)<sup>47</sup>。在文學傳播的範圍內，文學評論者的角色不僅僅代大眾篩選訊息，更要為大眾詮釋作品，提供穩定的文化價值<sup>48</sup>。

余光中在七〇年代更兼具海外知識分子的身分，加深了在文化、文學場論述的力量。因為在七〇年代開始，台灣媒體意識到要擴大論述的主題，可以透過海外文學評論者的力量，由中國時報開始，開設了海外論壇的專題。痲弦就回憶：

當時，我的心思全放在加強幼獅文藝對全球華文創作的影響方面，我想把刊物的格局放大，廣邀海外作家的稿件，使台灣成為世界華文文學的中心。編幼文之前我曾應美國國務院之邀，赴愛荷華「國際作家工作坊」研習，對後來幼文工作的拓展幫助極大。稍後，人間副刊正式增闢海外專欄，由高信疆主持。在信疆的擘畫之下，人間副刊的版面使人耳目一新。記得當時我還提供許多海外作家的姓名地址給他使用，希望彼此呼應，把這個計劃發展得更好，影響更大。可以這麼說，在編輯的理念上，高信疆和我是彼此互相影響的。<sup>49</sup>

<sup>45</sup> Edmundson, Mark. *Literature against philosophy, Plato to Derrida: A defence of poe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4.

<sup>46</sup> 馮建三，〈大眾媒介的編制外工作者之研究：以臺灣報紙的學院知識份子撰稿者為例 1951-1991〉，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報告，1993。

<sup>47</sup> Verdaasdonk, Hugo, "Expertise and choice behavior of cultural gatekeepers: Event history analyses of lists of bestselling fiction," in Keunen, Bart & Eeckhout, Bart Eds. *Literature and Society: The Function of Literary Sociology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2001, p.58.

<sup>48</sup> 張榮翼，〈文學批評的守望意識〉，《重慶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期（1997年3月），頁89。

<sup>49</sup> 痲弦，〈序〉，收入林崇漢，《諸神黃昏》（台北：聯合文學，2006），頁13。

檢視中國時報的海外論壇，讓海外的文藝評論家有廣大的篇幅可供發揮，引入了余光中、李歐梵、黃維樑、張系國、關傑明、水晶等名家的論述，也為其後現代詩論戰與鄉土文學論戰奠基。

以余光中在七〇年代的文學傳播為例，不難發現無論是「沙田幫」的文學社群聚集，影響香港現代詩壇發展，向台灣引介香港作家，實與余光中的學院詩人、評論家身分關係密切。更與當時文學傳播場中，媒體借重海外知識分子的論述衝擊封閉的文化環境，有著特殊的時空因素。

#### 四、余光中七〇年代在台港的文學傳播

余光中在七〇年代長住的香港，由於工業化、城市化的雙重衝擊下，文學界開始有意塑造與強化香港城市意識，打造香港文學主體性<sup>50</sup>。

##### （一）在香港引介英、美現當代文學

冷戰期間，美國國務院與中情局以香港為據點，進行意識形態的反擊，培植許多文學媒體。美國支援下創辦的右翼立場文學雜誌有《中國學生周報》、《祖國》、《大學生活》、《兒童樂園》等，綜合性月刊有《今日世界》、文化機構則有亞洲出版社及其《亞洲畫報》，形成了所謂的「美元（援）文化」<sup>51</sup>。

除了在經濟匱乏的時期贊助了文人生活與文藝發展，「美元文化」的間接效應是為了宣傳美方的價值觀，翻譯大量的美國文學作品，增進香港文藝青年對西方文學的認識<sup>52</sup>。美國新聞署的「今日世界」出版社也曾大量譯介美國現代詩與小說。美國新聞處當然是美國對外的宣傳機構，但旗下的今日世界出版社當時卻匯集了一群譯林高手，如宋淇、高克毅、思果、湯新楣、張愛玲、姚克、

<sup>50</sup> 白楊，〈文化想像與身份探尋——當代香港文學意識的嬗變〉（吉林：東北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頁45。

<sup>51</sup> 鄭樹森，〈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新詩〉，收錄於《現代中文文學學報》1卷2期（1998年1月），頁2-3。

<sup>52</sup> 盧瑋鑾、鄭樹森、黃繼持，〈香港文學年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九年）三人談〉，收錄於鄭樹森、黃繼持、盧瑋鑾編，《香港新文學年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九年）》（香港：天地，2000），頁1-35。

王敬羲、余光中、聶華苓、劉紹銘、戴天等，為它譯書，譯出了霍桑 (Hawthorne)、愛默森 (Emerson)、歐文 (Owen)、海明威 (Hemingway)、安德森 (Anderson)、費滋傑羅 (Fitzgerald)、史坦貝克 (Steinbeck)、奧尼爾 (O'Neill)、懷爾德 (Wilder)、貝婁 (Bellow)、瑪拉末 (Malamud) 這些作家的散文小說。由林以亮主編、余光中、張愛玲等譯的《美國詩選》，比《現代》時期的美國現代文學專輯有更專業的翻譯和編輯<sup>53</sup>，牽引著台港的現代文學從繼受法國象徵主義美學以及日本新感覺派的風尚，轉而與美國現代主義文學亦步亦趨的現象。

余光中除了在 1961 年譯《美國詩選》，在 1972 年還為今日世界出版社翻譯了梅爾維爾 (Herman Melville) 的《錄事巴托比》，為中英對照本。余光中身處左、右勢力對立的香港，為「美元文化」出版單位翻譯，又來自台灣，自然成為左翼文人攻擊的對象。1974 年余光中赴港後，即遭《盤古》雜誌發起的《余光中是愛國詩人嗎？》的批判，以及來自各方的攻擊<sup>54</sup>，余光中的態度是：

來後不久，我的右言不悅左耳，一陣排炮自左轟來，作者站在暗處，多用筆名，顯得人多勢眾的樣子，老實說，那樣的炮聲並不震耳，我笑一笑，且當歡迎的禮炮聽吧，四十年前，胡適、徐志摩、梁實秋、林語堂等人的經驗，也許就是這樣吧？這些作家的名字，在左派的新文學史上，固然都被塗黑了，但是當日左聯那許多名作家，曾經是活躍的前進的，現在又在哪裏呢？……想起遠如孔子近如「最親密的戰友」無不遭批，則我身上的這一點灰塵，拂去便罷，其中細節原不值得向國內喋喋報導。<sup>55</sup>

可見在左翼的攻擊下，余光中並未涉入筆戰，專注在自身的創作、教學、評論與翻譯工作上。

<sup>53</sup> 梁秉鈞，〈「改編」的文化身份：以五十年代香港文學為例〉，《文學世紀》5 卷 2 期，總 47 期 (2005 年 2 月)，頁 53-64。

<sup>54</sup> 古遠清，〈香港文學版圖中的「沙田文學」〉，收錄於黃曼君、黃永林編，《火浴的鳳凰，恆在的繆斯：余光中暨香港沙田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頁 61-68。

<sup>55</sup> 余光中，《青青邊愁》(台北：純文學，1978)，頁 309。



## （二）從學院出發的文學傳播

余光中在六〇年代即對香港詩壇有所影響，不僅僅出自作品的感染力，更來自大學中講學的春風化雨，讓詩教從校園擴及到文學圈。鄭樹森就指出<sup>56</sup>，1964年自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業的香港僑生溫健騮，在政大時曾旁聽余光中在西語系兼課的「英詩選讀」，就深受余光中的感染。溫健騮返港後接編《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在1967年1月6日介紹李賀〈北中寒〉，文中對李賀的推崇、希望新詩能夠調和現代和古典，與余光中隔海呼應。而另一位留學台灣師範大學的香港僑生羊城，也是余光中在英文系的學生，1967年5月5日在《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開始寫專欄〈根輝詩話〉，也回應溫健騮，強調要掌握中國文字的特性，注意傳統格律、聲韻、響度，自古詩吸收音樂性。在顯現出，余光中的詩學理論與實踐，通過溫健騮、羊城二位，間接在港推廣流傳。

余光中在1974年於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後，改在中文系教書，更接任過聯合書院的中文系主任。開設有：「中國新詩」、「中國現代文學」、「比較文學」，和中文碩士班的「新來學研究」與「高級翻譯」<sup>57</sup>。五四以後三十年間的新文學，余光中在大陸的少年時代就已經有所接觸，但在台灣受限於出版管制，仍能接觸的少數作家只有徐志摩、朱自清、郁達夫等人，七〇年代的香港卻毫無禁忌，為了教學而重新閱讀新文學作品，引發不同的想法：

坦白地說，早期的那些名作家，尤其是詩人和散文家，真能當大師之稱的沒有幾位，同樣是備課，我從他們那裏能學到的東西，遠不如以前教過的「英詩」、「現代詩」和「英國文學史」，但是不成功的作品甚至劣作，仍然可以用做「反面教材」，在文學課上，教學生如何評斷劣作，其價值，不下於教他們如何欣賞傑作。<sup>58</sup>

<sup>56</sup> 鄭樹森，〈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新詩〉，《現代中文文學學報》1卷2期（1998年1月），頁155。

<sup>57</sup> 余光中，《青青邊愁》，頁311。

<sup>58</sup> 同上註。

余光中在中文大學開設系列新文學課程，開風氣之先，其後黃維樑、梁錫華也接力開設，再加上在八〇年代開始學術圈重視香港文學，中文大學裡盧瑋鑾、黃繼持陸續開課，造就了香港文學教育的變化<sup>59</sup>。

余光中在中文大學期間所指導的學生中，以西茜鳳、王良和在香港文壇最受注目。西茜鳳本名黃綺瑩，是黃維樑的胞妹，1975年畢業於中文大學英文系，第一本書《大學女生日記》由余光中作序，八〇年代中期出版，寫沙田校園裡愛情故事，是香港知名的小說家。而王良和在八〇年代中期畢業於中大中文系，受教於余光中、梁錫華等人，寫詩與散文，曾獲《大拇指》詩獎、中大高雄先生紀念文學獎及多屆青年文學獎、中文文學創作獎、香港藝術發展局文學獎新秀獎等。詩集《柚燈》與小說集《魚咒》曾獲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詩風深受余光中影響<sup>60</sup>。

余光中在教學之餘，經常投身香港的文學活動。和台灣以副刊為主的文學傳播不同，七〇年代的香港有七十家報紙，一百九十種雜誌期刊，香港辦報和辦商業一樣，以營利為目的，因此報紙大部份刊登娛樂性報導，投合讀者口味<sup>61</sup>，副刊多為專欄方塊，也鮮少舉辦文學活動。余光中所參與的社會實踐，多為青年學子興辦的文藝活動。根據余光中的描述：

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兩校的學生會，聯合舉辦了好幾屆的「青年文學獎」，對香港大專和中學的文學創作風氣鼓勵很大，兩校的「文社」也經常舉辦演講會和文藝營之類的活動，以補正規文藝教育之不足，一九七六年夏天，「全港學界徵文比賽」和「突破雜誌社徵文比賽」，規模也頗大，另外一個大規模的文藝活動，是每年十一月舉辦的「香港校際朗誦節」，參加的中、小學生在千人以上……。這種種活動我不免都要參加，不是擔任主講，就是擔任評判。<sup>62</sup>

<sup>59</sup> 黃維樑，訪談記錄，2008年3月25日，花蓮：東華大學。

<sup>60</sup> 黃維樑，〈余群、余派、沙田幫〉，收錄於黃曼君、黃永林主編，《火浴的鳳凰，恆在的繆斯——余光中暨香港沙田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集》，頁21。

<sup>61</sup> 林友蘭，《香港報業發展史》（台北：世界書局，1977），頁163。

<sup>62</sup> 余光中，《青青邊愁》，頁310。

因此要斷言，余光中藉由擔任評審而直接影響香港的文風，未免過於輕率。畢竟文學獎都由評審委員會議定奪，焦桐就指出，文學獎的評審會議本身就是一種權力場域，評審們均有各自的文學觀和審美品味，其中有意向的衝突，也有意向的一致，評審展開說服，彼此試圖在異中求同，名次的產生依賴多種力量的折衝協調<sup>63</sup>。評審的影響力往往透過評審會記錄傳播給作家，評審意見成為一種獎勵的承諾，會刺激參賽者盡量去符合評審的偏好，構成參賽者的預期反應。余光中透過文學獎、演講與座談與青年互動，雖非直接，但在七〇年代的香港文學圈產生相當巨大的影響力。

### (三)「沙田幫」的相濡以沫

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學期間，與宋淇、黃國彬、梁錫華、黃維樑、蔡思果等人相友好，余光中戲稱為「沙田幫」。實際上應當是一個沒有共同文學主張的文學社群，隨著七〇年代中期的因緣聚會，這批作家在匯集在香港中文大學，可說是香港高等學府文學園地空前的一段花團錦簇。這群人最重要的人物是余光中，但他從未以領袖自居，也未想過成立文社、詩社<sup>64</sup>。

正式將「沙田幫」或「沙田文學」推向文學評論界，梁錫華與黃維樑的努力，功不可沒<sup>65</sup>。梁錫華的〈沙田出文學——香港文學史一則〉一文<sup>66</sup>，界定「沙田文學」的範疇與意涵。黃維樑的〈余群、余派、沙田幫〉一文<sup>67</sup>，則從出版品、教科書選集以及學術研討會等方面，討論余光中影響下的沙田文學風潮。

如就出版品分析，沙田文學的代表作計有余光中編《文學的沙田》、黃維樑編《沙田文叢》十餘種、黃維樑編選《吐露港春秋——中文大學散文選》、王良和、江弱水編《坐看雲起時——中大校園散文選》、中文大學中文系出版《歲華

<sup>63</sup> 焦桐，〈文學獎〉，《臺灣文學的街頭運動》（台北：時報，1998），頁 251-253。

<sup>64</sup> 梁錫華，〈沙田出文學——香港文學史一則〉，《大公報》，1993 年 11 月 3 日、10 日。

<sup>65</sup> 李松林，〈發自心靈的呼喊——傳出時代的信息〉，收錄於黃曼君、黃永林編，《火浴的鳳凰，恆在的繆斯：余光中暨香港沙田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331-337。

<sup>66</sup> 梁錫華，〈沙田出文學——香港文學史一則〉，《大公報》，1993 年 11 月 3 日、10 日。

<sup>67</sup> 黃維樑，〈余群、余派、沙田幫〉，頁 21。

集》等<sup>68</sup>。顯見，沙田文學指涉的範圍從余光中在沙田時期的文人雅聚，擴及「凡是在沙田任教或從那裡畢業的學生，並有可觀的作品發表者，均可視為沙田作家。」黃維樑曾說：「沙田已不僅是沿河海開墾出來的一塊土地——香港的一個衛星城市；它是崇山峻嶺懷抱之中，迴響著韓潮蘇海的一塊文學良田」<sup>69</sup>。

如果就香港文學典律化的角度觀察，香港教育署公布了中學國文科「初中階段推薦篇章」，沙田文學家有陳之藩、黃國彬、黃維樑、潘銘燊、思果、王良和、小思、余光中入選，佔香港作家文章的百分之四十三<sup>70</sup>。香港教科書中，沙田文學的比例高，也可證明沙田文學的重要性。

#### （四）向台灣介紹香港的新銳文學

根據余光中的觀察，香港是不利文藝的重商社會，加以對中文不夠重視，中學教育又偏重英文，因此一般中文程度難以提高，純正的文學期刊不多，報紙的副刊也不注重純文學，自然妨礙了文學傳播的健全。他指出：

投稿如此，出書更難，林以亮、劉以鬯、徐訏、思果、也斯等作家反而在台北出書，至於在本地寫作多年頗有文名的詩人，如戴天、西西、鍾玲等，迄今竟未結集出版，這樣的環境實在是很難自成一個文學傳統的。<sup>71</sup>

余光中向台灣讀者介紹香港新銳文學，使台灣文壇有機會認識香港的青年作家，以及提前閱讀大陸傷痕文學創作。

余光中向台灣推薦的香港作家，當以梁錫華最為著稱。梁錫華在台灣文壇初次露面寫徐志摩的文章，就是由余光中推薦發表<sup>72</sup>。余光中並為梁的散文集《揮袖話愛情》寫序，指出梁錫華的優點與缺點：「半生遠托異國的洋博士胸中，竟有這許多章回小說的江湖雜學」<sup>73</sup>。其後梁錫華的著作多數在台灣出版，

<sup>68</sup> 古遠清，〈香港文學版圖中的「沙田文學」〉，頁 61-68。

<sup>69</sup> 轉引自梁錫華，〈沙田出文學——香港文學史一則〉，《大公報》，1993 年 11 月 3 日、10 日。

<sup>70</sup> 黃維樑，〈余群、余派、沙田幫〉，頁 20。

<sup>71</sup> 余光中，《青青邊愁》，頁 309。

<sup>72</sup> 古遠清，〈香港文學版圖中的「沙田文學」〉，頁 61-68。

<sup>73</sup> 余光中，〈推薦序〉，收錄於梁錫華，《揮袖話愛情》（台北：九歌，1981），頁 8。

而且都完成於香港，他的文學生命開始於香港，成名於台灣，是台港文學傳播上，一個典型的例子。

另一個由余光中引薦給台灣讀者的是小說家金兆。在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接近尾聲時，不少被迫「上山下鄉」的前「紅衛兵」、知識青年，冒生命危險以各種方式逃至香港<sup>74</sup>。小說家金兆先生本名梁鈺文，原是香港華僑，1950年進入北京清華大學就讀外文系，畢業後到「北京大學」任教，一直到1976年以「父母年老在外，必須繼承產業」為由，回到香港。金兆因余光中的鼓勵，在聯副發表了十一篇短篇小說：〈芒果的滋味〉（獲聯合報小說徵文短篇小說第三名）、〈離婚〉、〈顧先生的晚年〉、〈考試風波〉、〈紅華僑〉等，是台灣最早接觸到的傷痕文學作品。余光中曾為文評介金兆的小說，推崇金兆小說可以填補張愛玲與陳若曦小說的不足，擴大讀者對大陸的認識<sup>75</sup>。金兆的作品在大陸傷痕文學風湧之前發表，在台港文學傳播上，由於香港的自由環境，加上台灣副刊重視文學，才能培育出如是文學作品。

## 五、結語

隨著史料不斷的挖掘與體系化，歷來提及五〇年代中葉前後的香港文學，多半認為香港是受到台灣現代派的影響，但是八〇年代後，隨著劉以鬯提出異見後<sup>76</sup>，港台兩地現代主義美學「互有影響」的說法，較為一般學者接受<sup>77</sup>。鄭樹森甚至認為《文藝新潮》是「一九五〇年代港台兩地現代派文學的一大集結地」，多元的譯介甚至超越《現代文學》<sup>78</sup>。可見在文學史的評價上，台、港兩地現代主義文學運動有著微妙的傳播、互動與競爭關係。

<sup>74</sup> 鄭樹森，〈回顧香港在海峽兩岸間的文化角色（2）〉，《聯合報》「聯合副刊」，1997年6月15日，41版。

<sup>75</sup> 余光中，〈紅旗下的耳語：評析金兆的小說〉，《聯合報》「聯合副刊」，1980年5月9日，8版。

<sup>76</sup> 劉以鬯，〈三十年來香港與台灣在文學上的相互聯繫（上）〉，《星島晚報·大會堂》，1984年8月22日。

<sup>77</sup> 盧瑋鑾，〈香港文學研究的幾個問題〉，收錄於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編，《追跡香港文學》，頁65。

<sup>78</sup> 鄭樹森，〈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新詩〉，收於《現代中文文學學報》1卷2期（1998年1月），頁47。

當時序進入七〇年代的台港文學，微妙的傳播、互動與競爭關係不減反增，七〇年代初期，關傑明發表了批評現代詩的文章，激起了「現代詩論戰」。在論戰中，論者批判了現代詩的個人主義、形式主義，也批判了現代詩的晦澀，無民族風格，積極提出了文學的社會性和群眾性<sup>79</sup>。香港文壇對台灣的撼動力，已經不再僅限於美學觀念的主張，更及於文化、社會乃至政治面的衝擊力道。

從余光中在七〇年代台港文學跨區域傳播過程中，不難發現港、台兩地確實有共時，或是相呼應、影響又各自在地化的文學現象。

台、港七〇年代文學界，都開始正視中國傳統，掃除五、六〇現代主義文學過於西化、晦澀及自我的弊病，期盼將文學植根傳統，反映現實，並追尋本土性與認同。余光中七〇年代在港、台文學傳播最大的意涵，莫過於以其綜合古典與現代主義的理論，在引介英美現當代文學的同時，讓兩地詩壇重新省視傳統與當代的交互影響力。

台、港在七〇年代開始，文學的學院體制日益健全，也引發許多新興的文學傳播現象。如香港中文大學從七〇年代中葉，開始重視現、當代文學發展，聘任余光中、梁錫華、黃維樑等在華語文學圈知名的作家、比較文學學者與翻譯家，開設系列課程，開啟文學教育的新里程碑。而「沙田幫」文友之間的聚合，形成當代文學研究的課題，從布爾迪厄（Bourdieu）的「文學場」理論中，不難發現學者在文學場域中具有「支配權力」，特別當學者社群透過文學評論的力量，強化了運用象徵資本爭取象徵支配權，自然更加引發矚目與重視。而在台灣七〇年代文學場域中，余光中在台港間的跨區域文學傳播現象，正說明了學院作家高度的影響力，當時文學傳播場中，媒體借重海外知識分子的論述衝擊封閉的文化環境，無論在現代詩論戰、鄉土文學論戰以及香港作家的推介上，余光中的評論文字都備受矚目，成為論戰或是閱讀的焦點，自有其來自文學傳播結構的源由。

誠如余光中所說：「潮流起落，理論消長，派別分合，時而現代姿態，時而古典花招，時而普羅口號，都只是西征途中東歸道上的虛影幻象，徒令弱者迷

<sup>79</sup> 陳映真，〈四十年盪臺灣文藝思潮之演變〉，《鳶山》（台北：人間出版社，1998），頁 220。

路，卻阻不了勇者的馬蹄。」<sup>80</sup>文學研究有一定的侷限，無法盡窺詩人在文學傳播上真正的影響力，但站在大師的肩膀上，確實開啟了未來台港文學研究的新進路。

---

<sup>80</sup> 余光中，〈「與永恆拔河」後記〉，《聯合報》「聯合副刊」，1979年3月23日，12版。

## 參考書目

- 王宏志、李小良、陳清僑編，《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台北：麥田，1997）。
- 王於飛，〈明末東林復社的一個側影〉，收於靳明全編，《區域文化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 65-79。
- 王劍叢，《香港文學史》（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5）。
- 王劍叢，《二十世紀香港文學》（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6）。
- 王德威，〈《本土性的糾葛》序〉，《香港文學》231 期（2004 年），頁 81-82。
- 半枝荷，〈詩人余光中演講側寫〉，《中國學生周報》1091 期（1973 年），4 版。
- 古遠清，〈香港文學版圖中的「沙田文學」〉，收錄於黃曼君、黃永林編，《火浴的鳳凰，恆在的繆斯：余光中暨香港沙田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頁 61-68。
- 白楊，《文化想像與身份探尋——當代香港文學意識的嬗變》，（吉林：東北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
- 向陽，〈七〇年代現代詩風潮試論〉，收錄於林耀德編《當代文學評論大系二》（台北：正中書局，1993），頁 327-374。
- 朱崇科，〈淺評楊松年《戰前新馬文學本地意識的形成與發展》〉，《南洋商報》，2001 年 11 月 30 日。
- 朱崇科，〈文學空間詩學與區特質論綱——以新馬華文文學為例加以說明〉，《香港文學》272 期（2007 年），頁 90-94。
- 余光中，〈余光中先生「詩風周年紀念朗誦會」的演講詞：中國的現代詩，從何處來，向何處去？〉，《詩風》14 期（1973 年），頁 2-3。
- 余光中，《青青邊愁》（台北：純文學，1978）。
- 余光中，〈「與永恆拔河」後記〉，《聯合報》「聯合副刊」，1979 年 03 月 23 日，12 版。



- 余光中，〈紅旗下的耳語：評析金兆的小說〉，《聯合報》「聯合副刊」，1980年5月9日，8版。
- 李松林，〈發自心靈的呼喊——傳出時代的信息〉，收錄於黃曼君、黃永林編《火浴的鳳凰，恆在的繆斯：余光中暨香港沙田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頁331-337。
- 易明善，《香港文學簡編》（重慶：四川大學出版社，1995）。
- 林友蘭，《香港報業發展史》（台北：世界書局，1977）。
- 林煥彰，〈簡介「詩風」〉，《文訊》20期（1985年10月），頁89-93。
- 施建偉、汪義生，〈當代香港文學的鑄形——回首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學〉，《香港文學》147期（1997），頁4-7。
- 施懿琳，〈臺南府城古典文學的發展研究與展望〉，發表於「跨世紀／第一屆臺灣文學史料編纂研討會」，2000。
- 流沙河，〈詩人余光中的香港時期〔上〕〉，《香港文學》48期（1988年12月），頁16-19。
- 徐明德，〈區域文化與文學關係斷想〉，收錄於靳明全編，《區域文化與文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頁180-187。
- 袁良駿，《香港小說史》（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
- 張榮翼，〈文學批評的守望意識〉，《重慶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期（1997），頁81-89。
- 張錦華，〈從 Pierre Bourdieu 的文化社會學看閱聽人主體〉，《傳播理論》3期（2002），頁61-105。
- 梁錫華，〈沙田出文學——香港文學史一則〉，（香港）《大公報》，1993年11月3日、10日。
- 梁秉鈞，〈「改編」的文化身份：以五十年代香港文學為例〉，《文學世紀》5卷2期（總47期）（2005），頁53-64。
- 許翼心，《香港文學觀察》（廣州：花城出版社，1993）。
- 陳映真，〈四十年蘊臺灣文藝思潮之演變〉，《鳶山》（台北：人間出版社，1998），頁207-223。

- 陳文芬，〈余光中傳記茱萸的孩子圖〉，《中國時報》，1999年2月4日。
- 陳芳明，《左翼台灣：殖民地文學運動史論》（台北：麥田，1998）。
- 陳芳明，《後殖民台灣：文學史論及其周邊》（台北：麥田，2002）。
- 陳芳明，《殖民地摩登——現代性與台灣史觀》（台北，麥田，2004）。
- 陳慶元，〈區域文學與地理環境〉，《涪陵師專學報》1期（1999），頁41。
- 陳國球，〈香港五、六十年代現代主義運動與李英豪的文學批評〉，《中外文學》34卷10期（2006），頁7-42。
-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高雄：春暉，1997）。
- 焦桐，《台灣文學的街頭運動》（台北：時報，1998）。
- 須文蔚，〈學院文學社群聚合下遷移者的花蓮書寫：以顏崑陽的小說與散文為例〉，發表於第三屆花蓮文學研討會，花蓮：花蓮文化局主辦，2005。
- 馮建三，《大眾媒介的編制外工作者之研究：以臺灣報紙的學院知識份子撰稿者為例 1951-1991》，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報告，1993。
- 黃曼君、黃永林主編，《火浴的鳳凰恒在的繆斯——余光中暨香港沙田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 黃維樑，〈余群、余派、沙田幫〉，收錄於黃曼君、黃永林主編，《火浴的鳳凰恒在的繆斯——余光中暨香港沙田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集》（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
- 黃繼持、盧瑋鑾、鄭樹森，《追跡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1998）。
-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87）。
- 詩風編輯室，〈發刊詞〉，《詩風》1期（1972），頁1。
- 游勝冠，《臺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台北：前衛，1996）。
- 趙稀方，《小說香港》（北京：三聯書店，2003）。
- 劉登翰主編，《香港文學史》（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
- 劉以鬯，〈三十年來香港與台灣在文學上的相互聯繫（上）〉，《星島晚報·大會堂》（1984）。
- 潘亞墩、汪義生，《香港文學概觀》（廈門：鷺江出版社，1993）。

- 鄭煒明，〈香港文學的歷史考察——一個文學工作者的觀點〉，收錄於《文訊》217期（2003年11月），頁37-39。
- 鄭樹森，〈回顧香港在海峽兩岸間的文化角色(2)〉，《聯合報》「聯合副刊」，1997年6月15日，41版。
- 鄭樹森，〈香港專輯 回顧香港在海峽兩岸間的文化角色 11：臺港的新詩互動〉，《聯合報》「聯合副刊」，1997年6月26日，41版。
- 鄭樹森，〈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新詩〉，收錄於《現代中文文學學報》1卷2期（1998年1月），頁149-158。
- 黎湘萍，〈族群、文化身份與華人文學——以臺灣香港澳門文學史的撰述為例〉，《華文文學》1期，2004年4月。
- 盧建榮，《臺灣後殖民國族認同》（台北：麥田，2003）。
- 龍秋，〈從余光中訪港說起〉，《中國學生周報》1092期（1973），8版。
- 謝常青，《香港新文學簡史》（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0）。
- 譚楚良，〈50、60年代香港現代派文學〉，《中國現代派文學史論》（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頁309-317。
- 痲弦，〈序〉，收入林崇漢，《諸神黃昏》（台北：聯合文學，2006）。
- Bourdieu, P., *The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S. Emanuel, Trans.), Oxford, UK: Polity Press, 1996. 劉暉譯，《藝術的法則——文學場的生成和結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
- Edmundson, Mark. *Literature against philosophy, Plato to Derrida: A defence of poet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Escarpit, Robert (1958). *Literature and society Authorship*. 葉淑燕譯，《文學社會學》（台北：遠流，1990）。
- Shumway, D. R. & Messser-Davidow, E., “Disciplinary: An introduction,” *Poetics Today*, vol.12: 2 (1991) / 黃德興譯，〈學科規訓制度導論〉，收錄於香港嶺南學院翻譯系文化社會研究譯叢編委會，《學科·知識·權力》（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頁1-22。

Verdaasdonk, Hugo, "Expertise and choice behavior of cultural gatekeepers: Event history analyses of lists of bestselling fiction," in Keunen, Bart & Eeckhout, Bart Eds. *Literature and Society: The Function of Literary Sociology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2001), pp.57-92.

深度訪談

黃維樑，2008年3月25日，花蓮：東華大學。